



古典诗学的 现代诠释

蒋寅 著



中华书局

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

蒋 寅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蒋寅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ISBN 7—101—03436—5

I . 古… II . 蒋… III .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
—中国 IV .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2505 号

书 名	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
著 者	蒋 寅
责任编辑	宋凤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1/2 字数 198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436—5/I·435
定 价	15.00 元

本书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谨致谢忱！

目 录

1	引论:古典诗学的遗产及其价值
1	(一)转换:困境与出路
5	(二)立场转换:尊重理论遗产的历史价值
7	(三)理论遗产发掘和诠释的历史取向
	一 语象·物象·意象·意境
13	——诗歌本文构成的基本单位
15	(一)意象·意境概念使用的纷乱
17	(二)意象与物象·语象的区别
23	(三)意境的本文属性
27	(四)语象·物象·意象·意境的重新定义
	二 清:诗美学的核心范畴
32	——诗美学的一个考察
32	(一)“清”在古典诗学中的位置
35	(二)作为传统审美趣味的清
40	(三)清在诗学中的确立
48	(四)清的美学内涵

2 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

54 (五)清作为诗美的核心概念

三 以禅喻诗

59 ——以禅喻诗的逻辑依据

63 (一)不可言说的言说:禅与诗的表达欲求

69 (二)不说破和悟入:诗学中的以禅喻诗

四 不说破

78 ——“含蓄”概念之形成及其内涵增值过程

78 (一)“含蓄”概念溯源

85 (二)“不说破”与“绕路说禅”

89 (三)代语·不犯题字·不著题

五 起承转合

100 ——诗学中机械结构论的消长

101 (一)诗学中起承转合之说的由来

104 (二)起承转合与八股文之关系

107 (三)起承转合之说在诗学中的展开

111 (四)诗学对起承转合之说的清算

六 至法无法

122 ——古典诗学对技巧的终极观念

123 (一)法与对法的超越

126 (二)“至法无法”的两个例证

130 (三)法的重新定位

134 (四)至法无法的哲学内涵及思想渊源

七 诗中有画

142 ——一个被夸大的批评术语

142 (一)问题的提出

144 (二)历来对诗画关系的理解

148 (三)王维诗对画的超越

153 (四)“诗中有画”作为批评标准的限度

八 角色诗

160 ——角色诗中的性别意识

161 (一)“角色诗”概念及种类

167 (二)角色诗的历史发展

170 (三)角色诗的单一性向

174 (四)性别转换的深层心理

九 文如其人?

181 ——诗歌作者和文本的相关性问题

181 (一)作为传统观念的“文如其人”

185 (二)难以反驳的诘难

188 (三)文不如其人的理论依据

193 (四)“文如其人”命题成立的限度

十 言志·感物·缘情

201 ——有关诗歌观念转变的考察

203 (一)“感物”对象的转移:人事与自然

205 (二)“感物”含义的分化:本源与动机

210 (三)悲情时代:感物与情感中心论的确立

十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217 ——以唐诗繁荣原因的探讨为中心

217 (一)命题的提出

221 (二)文学繁荣原因的结构分析

225 (三)决定艺术成功的内在机制

十二 以诗为性命

233 ——中国古代对诗歌之人生意义的几种理解

234 (一)“不朽之盛事”

238 (二)“其文在即其人在”

242 (三)“以诗为性命”

4 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

246 (四)“文字留传胜子孙”

256 附录

259 后记

引论：古典诗学的遗产及其价值

迄今为止，我出版的著作都没有序。《大历诗风》授梓时，先师千帆先生嘱宜请未参与博士论文评审的傅璇琮先生作序。当时傅先生特别忙，我实在不忍打扰，经老师同意，改请赵昌平学长序之，而昌平兄谦辞，遂无序。此后出书也没再请人作序。盖请人作序之难，诚有如魏叔子所云：“其文是而人非者不足叙，其人是而文非不足叙也；文与人是矣，非其中心所乐道，不足叙也；中心乐道之，而不能知其甘苦曲折之故，亦不足叙也。”^①这四不足，足以令人生畏，于是本书仍只能自作引论，略述存心命意之所在。

（一）转换：困境与出路

本书是对中国古典诗学若干概念和命题的

2 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

初步阐释。有些概念和命题迄今还很少被批评史和古代文论研究所触及,这正是我构思和从事本书写作的直接动因。我希望用我的工作反映古代文论研究还很薄弱的现状,并表达我对学科发展的基本思路。

正如大家都切身感受到的,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尽管文学原理、文学概论或研究专著一种一种接踵问世,层出不穷,但叩其价值,且不说独创性,就是知识水准和理论完成度又怎么样呢?由于没有解决哲学基础的问题,又脱离中国当下文学经验,一味稗贩西方现代文论,而缺乏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和言说立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更不具有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解释能力。虽然理论界也不断有种种新概念和新命题提出,但这些时髦的衣装终究裹不住萎缩贫血的理论身躯。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②我曾经不太赞同“失语症”的提法,认为它发自文化上的自卑和理论创造上的浮躁,是个虚假命题,但现在我的看法有所改变:这种说法的流行本身就说明了文学理论的学术困境。

“失语”的困境让文学理论界想起了古代文论,文学理论和比较诗学学者们忽然都对古代文论感兴趣起来,而且很快一批论著就从他们笔下产生。学者们急切想从古代文论的遗产中发掘理论资源,希望以某种带有本土化和民族化色彩的文论素材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话语,于是“转换”的口号顺理成章地被提了出来。在古

代文论的基础上转换、生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似乎成了学术界一致瞩目的充满光明前景的道路。而古代文论界也像一个僻远乡村突然因古迹成为旅游胜地，全村都兴奋起来一样，热烈欢呼“转换”的口号，希望藉此激活走向僵化和停滞的古代文论研究^③。

“转换”果真能将我们带出文学理论的困境吗？

光明的初曙尚未看到，一种令人担忧的氛围已弥漫开来。急功近利的学术态度并不能带来富有成果的扎实研究，只会助长信口雌黄的轻浮学风。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界由于不重视古代文学理论的遗产，不立足于中国文学经验，对中国文学理论一直存在许多偏见。即以古代文论的核心——诗学而言，最习见的偏见，一是说中国诗学“缺少全面的、系统的诗学专著，诗人和诗评家关于诗的发展史及诗的创作与鉴赏等方面的见解与阐述，多属个人经验式和感悟式的，尚未自觉地进行理论建构和实现整体把握”^④；一是说中国诗学“缺少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更不能严格地论证自己的结论，它更喜欢以比喻性的策略展示独特的内在感悟。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式诗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理论，它展示出来的是东方式智慧而不是西方式的智力”^⑤。这在文学理论界颇有代表性的结论显然是由西方中心的视点作出的判断，同时也是缺乏中国诗学知识的偏见。由于对古代诗学文献的缺乏了解，八十年代刊行的一些论著曾出现不少轻率的结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轻易地一笔抹煞，如上述武断的结论直到今天还有很大影响。而另一方面，近二十年间若干新撰文学批评通史或专史的陆续刊行，又让学界产生一种幻觉：“无论是对批评史资料挖掘整理，对某些文论家个案的研究，还是对‘史’的基本描述，对总体规律的解释，这些著作已做了集大成式的研究。”^⑥仿佛现在最缺乏和亟需的就是

理论阐释了。“转换”论的兴起,恰好呼应了这种判断,简直像一股春风吹来,古代文论界精神为之一振,众口一词,欢呼“转换”。然而在我看来,所谓“转换”,与“失语”说一样,也属于对理论前提未加反思就率尔提出的一个虚假命题,是不能成立的。

何以这么说呢?根据现有的文学史知识,每个时代的各种文学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文学经验上产生的,是对既有文学经验的解释和抽象概括(鼓吹和呼唤新文学的文本,都是宣言而不是理论)。当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经验产生,现有文学理论丧失解释能力时,它的变革时期就到来了。概念、术语、命题的发生、演化、淘汰过程都是顺应着文学创作的。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关“转换”的讨论难以深入了。一种文学经验消亡,它所支持的文学理论便也随之枯萎;一种文学经验旺盛,它所支持的文学理论也相应活跃,或被新的理论所吸收。职是之故,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及其中包含的理论内容,活着的自然活着,像“意象”、“传神”、“气势”等,不存在转换的问题;而死了的就死了,诸如“比兴”、“温柔敦厚”之类,转换也转换不了。“兴”到唐代就死了,因为唐人已不用“兴”的方式写诗,偶一为之不过是模仿古诗。所以从唐初开始,“比兴”就吸纳了《诗经》的美刺精神,被解释为一种直面现实政治的写作态度,到宋代“兴”就成了讽刺的别名。以致葛立方不无惋惜地说:“自古工诗者,未尝无兴也。观物有感焉,则有兴。今之作诗者,以兴近乎讪也,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⑦兴义既转移,后人常懒得用它,直接就用“美刺”。清初叶矫然也惋惜地说:“近人作诗,率多赋体,比者亦少,至兴体则绝不—见。不知兴体之妙,在于触物成声,冲喉成韵,如花未发而香先动,月欲上而影初来,不可以意义求者,国风、古乐府多有之。徐文长谓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无不皆

然,默会自有妙处,知言哉!”^⑧“兴”也许至今还活在陕北“信天游”里,但毕竟远离当代诗歌写作,如何将它转换为当代文学理论呢?如果转换为象征理论,那何不直接讲象征,而要用那本身带有的语境含义复杂得难以解释的古老概念呢?

说实话,我一见到今人用“天人合一”、“体用不二”、“三教合流”、“情景交融”之类的词就头疼。它们附着的语境意义过于复杂,那本身就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艰难课题。多少具体而有独特内涵的问题,就因随意使用这些大而无当的命题而牺牲了它们的价值。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些更具体、更切合实际的词,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一些规定性明晰、大家都容易理解、沟通,因而使交流变得更准确而有效的概念呢?我实在很难理解所谓“转换”的实质意义究竟何在。古代文学理论是古代文学的理论,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理论是新世纪文学的理论。没有一种文学理论能概括从古到今的文学,一个民族文学的古今差异常远甚于同一时代文学的民族差异,文学理论体系总是反映一种共时性的认知结果。如果一种文学理论抱有涵盖古今文学的野心,那就必然会像抽象地谈论艺术本质一样落入荒谬的逻辑困境:每个时代每种主义的艺术理念都不一样,你取哪种艺术为代表呢?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还是杜桑添上的胡子?希望将古代文论进行转换,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中国文学理论,窃以为恐不免缘木求鱼。这种理论思路,说到底反映了我们固有的对待文化遗产的一种价值偏见。

(二)立场转换:尊重理论遗产的历史价值

我们知道,“五四”新旧文学之争曾激发盘点家底的意识^⑨,并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⑩的口号。虽然置

身于当时的语境,整理国故的工作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急切的功利目的,但良好的学术训练和与国际同步的知识水准保证了研究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建国以后,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主导下,实用性的接受态度日益强化,无论对古典传统还是外来文明,除了区分香花、毒草,取菁去粕,关键还要落实到“用”字上。研究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首先关注的乃是对今天有什么用。诸如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类的宏大理由,看似立足点甚高,实质上和人们质问“你们研究古典文学有什么用”同一见识。在焦躁的“建立中国文论话语”的心理氛围下,古代文论又一度遭逢“古为今用”的荣遇。

在此起彼伏的“转换”声中,我想提问:在如何转换还不能形成清楚的认识之前,能不能先将古代文论研究的立场和出发点转换一下?古代文论毕竟是古代文学的理论,首先是属于历史范畴的东西,我们在研究这份文化遗产之前,能不能首先将它作为纯粹的认知对象,而暂不问对现时有什么用?

从事古代文化研究,当然有不同的学术取向,有来自不同方面的要求,问题是在要求“古为今用”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尊重一种超实用、超功利的研究态度,坦然承认纯粹认知本身的价值?我很赞同罗宗强先生提出的“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于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传统文化的素养;而不汲汲于‘用’”^①。这么说其实还是有广义的“用”的意识贯注其中的,我更欣赏那种追求“无用之用”的学问态度,那是一种超然的审美的态度,一种为好奇心驱使的求真的态度,发自对研究对象的浓厚兴趣和热爱。不是么?古代文学理论和所有古代文化遗产一样,是先民文学感性和理性思维的生态,是先贤智慧和理想的

结晶。它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中国人如何看待文学,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问题,见解达到什么深度,在人类对文学的认识史上处于什么水平。这样一种纯粹的认知研究,会产生许多有关古代文学理论的可靠知识。这些知识可以满足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心,满足我们自我认识的需要。

其实从根本上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原无所谓纯粹知识。人文——社会科学固有的价值判断色彩,使它的一切知识都基于某种文化立场。古代文学理论的知识同样也是在某种认识框架和价值尺度下形成的历史认识,它不仅受当代学术观念支配,也为文学史的研究水平所局限,同时它更与文学史研究相发明,小则可以深化中国文学史研究,大则能充实甚至改造世界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这看似与“转换”论殊途同归,但学术立场完全不一样。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重要,中国文化愈益受到各国研究者的关注,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吸引了欧美、日韩的众多研究者,无论是传统文学研究还是戏曲、小说及说唱等俗文学研究都产生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相比之下,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有关专家和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基本上还是个未受到国际汉学重视的研究领域。由于对中国古典文论知识的缺乏,整个当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始终没有汲取中国古代文论的资源,这对彼此都是一个遗憾。

(三)理论遗产发掘和诠释的历史取向

古代文学理论的被冷落,无疑与进入和理解的困难有关。深奥的古典语言,玄妙的抽象概念,复杂的历史语境,使尚友古贤走近他们的思想,变得困难重重。要发掘古代文学理论的矿藏,使古

典遗产向今天开放,不仅需要去做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做写作过程及动机的实证研究,还需要用现代文学理论知识来阐释其理论内涵。这种阐释,按我的理解首先是一种兑换,就像用公制来说明工部营造尺的长度,它决不应该是单纯的理论演绎,而应是还原到历史过程中的梳理,正像每个时代营造尺的单位值不同,古代文论概念、命题的内涵在不同时代也是不一样的。

的确,古代文论的主要概念和基本命题始终都处在不断的解释中,古代文论的承传和接受史也就是它的解释史。每一次解释都是传统话语与当下主体的对话,对话的结果形成概念和命题在不同语境下的历史内涵。就像长江和黄河,每一段河道的水质和水色都是不同的。就拿起承转合来说吧,它在各个时代被赋予的含义、人们对它的态度完全不同。在元代它被解释为近体诗的固定结构,对应于律诗的四联或绝句的四句;在明代它被解释为诗歌本文构成的逻辑序列,并被吸纳到八股文的章法结构中去;到清代它又因呆板僵化而遭批评,为诗论家所鄙薄与扬弃,最终泛化为作品的一般结构理论。不同时代的解释赋予它不同的理论内涵,曲折传达出不同的价值观。只有弄清这一演变过程,完整地描述这一命题发生、演变、定型的理论流向,才能把握它在历史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和古人的价值评估,从而作出包括命题全部理论内容的有效诠释。否则很容易流于盲人摸象:抓住元代诗论的会说起承转合是律诗章法论,抓住明代诗论的则说是试帖诗和八股文的章法论,而抓住清代诗论的又会说是文章的一般结构论。有人会说起承转合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也有人会说它在古人眼里毫无价值。如此这般,岂能把握概念和命题的基本内涵?只会以为古人使用概念随意,缺少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最终对古代文论的理论形态和价值取向作出轻率和肤浅的论断。

我们有理由强调，古代文论的阐释基点只能建立在一种历史研究上，在理论的历史展开中把握其发生、发展、转变的逻辑进程。这是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也是我一直倾心并付诸努力的目标。这样一种学术理念，不仅是方法论的终极体认，也是现时学术状况下的策略选择。尽管我也认为古代文论的理论阐释非常重要，需要有一批理论素养好的学者致力于此，也需要比较诗学学者参与，做理论内容、民族特征和历史发展的对比研究，但作为学科在现有学术积累下的策略选择，我认为首先还是应加强史的研究，具体说就是加强文献研究，加强文论和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近年多种批评史著作刊行，让学术界产生了史的研究已臻饱和、理论阐释则相对滞后的感觉，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我觉得古代文论的历史研究尚处于较浅的层次、较低的水平，古代文论的理论阐释水平难以提高，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明清以后的文论著作，大部分还没有被阅读，大量的文论资料还沉睡在各种典籍中，文学史的背景知识也不丰富，我们凭什么来作理论阐释呢？在古典文论研究的现阶段，似乎还是应该多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多做些局部的积累。

本着以上的思路，我从历年研究古典诗歌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出发，选择了十二个基础性的同时也是富有活力、涵盖广泛内容的概念和命题来进行讨论，希望通过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展示中国古典诗学的丰富内涵和理论价值，同时为建构富有民族思维特色和文化性格的本土文学理论提供一些参考。这些问题纵贯整个古典诗学史，涉及大量的文献资料，以我有限的知识和能力，当然不能指望阐释得很透彻，更不能将它们源流一一梳理清楚，我只是尽自己的努力而已。我希望将理论问题历史化，并相信历史研究是理论阐释的基础，只有历史的方式才能提供全面把握概念和命题的所有语境含义的可能。尽管本书并没有完全贯彻这一理念，